

爱心超市 呼唤爱心接力

本报记者 李娜 实习生 荆佳文 李焱图



群众捐助之后领取的登记证

核心提示

有这么一种超市,里面的商品来自于社区居民和单位的捐赠,这里的顾客是低保等困难群众,超市间流通的“货币”是领取卡……这种遍布郑州的“爱心超市”曾经风靡一时——依靠捐赠的货源,让低保户领取,这种将慈善和需求直接连接的方式“看起来很美”。但近日记者调查,爱心超市的经营遭遇各种尴尬,如何非盈利的运营,让爱心超市名副其实并且发挥作用,机制改革和财力支持一样都不能少。

一个看得见的慈善平台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慈善超市”(爱心超市)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ell),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我国的“慈善超市”最早出现于上海,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起来。2003年6月25日,位于郑州市大学路和民安路交叉路口的爱心超市开张,从此掀开郑州市爱心超市的新篇章。

“爱心超市”就是把原来政府的、部门的、社会的、企业的、个人的一些慈善资源,各界的爱心善举,整合到“爱心超市”这个平台上来,让有困难、需要帮助的群众能够有尊严地到“爱心超市”来选择、领取自己生活需要的物品。它一方面为本社区的低保家庭、大病重病家庭、孤老、孤儿等一系列困难的群众提供免费、廉价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为本社区及社会各界具有爱心的个人、单位提供长期捐赠的场所。

郑州慈善总会募捐办工作人员靳晔说:“爱心超市”是一个平台,既让困难的群众能

够获得爱心物品,又让捐赠者在关注他人、帮助他人中,享受到奉献的快乐。”

就是这么一个平台,运行以来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尴尬——

需求供给不相“匹配”

2010年的1月6日早晨,郑州市教育社区的低保户詹俊一早来到了位于经八路办事处的爱心超市,他想给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换上几支铅笔、几个作业本。

但环顾一周,爱心超市里并没有他想要的东西,无奈,他只好等下次再来……

“困难群众需要的东西很多,而市民捐赠最多的却是衣服。”爱心超市的负责人如是说。

为了解决供需不相“匹配”的难题,爱心超市除了向困难群众提供物品之外,还设置了“需求本”,随时记下群众需要的东西,一方面呼吁市民和企业捐赠相应物品,另一方面如果有了这些物品,好对号入座地发放。”采访中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爱心超市缺乏“造血功能”

二七区的困难群众陈晓静依然记得2003年的情景:“那是咱郑州市,也是河南省第一家爱心超市成立,400多平方米的超市看起来特别的气派,里头有食品区、被服区、鞋帽区、日用品区、家电区5大块……”成立当天,双双下岗的陈晓静夫妇给病中的

儿子抱回家一台电视机,满足了他们一家当时的小小愿望。

作为由市民政局主办,二七区民政局承办的郑州市首家爱心超市,无疑起了“模板”作用,拉开了郑州市办事处、社区建立爱心超市的序幕。自2003年起,郑州市内6区纷纷建立起爱心超市,不少学校建立起“学生爱心超市”,党政机关建立起“党员爱心超市”。据金水区民政局社建科科长阮小爱介绍,仅金水区17个乡镇办事处就都有爱心超市,1796户低保户定期去领取物品。

作为郑州市首家爱心超市,由于二七区的积极宣传,爱心超市一开始群众捐赠十分踊跃,收捐赠物品83594件,现金7.7万元。但是到了2008年,该爱心超市接收捐赠物品却只有3810件,现金2650元。负责人杨金荣说:“为了激发市民和单位的积极性,我们2009年搞了不少活动,捐赠物品才有所上升。”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经八路的爱心超市,负责人林科说:“去年接到社会上的现金捐赠非常的少,基本上都是一些衣物、被套等物品。”

场地、人员均不足

爱心超市成立之后,人员问题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各个社区办事处头疼的事情。拿经八路办事处来说,这里的爱心超市由社建科的工作人员兼职。林科说:“我们在二楼办公,爱心超市在一楼,如果有低保户过来,我们就会有工作

人员过来值班,解决问题。”

对此,阮小祥说:“我们只是要求各个办事处有爱心超市,但是如何经营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于是有的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兼职,有的是聘用了社区的贫困户,人员、场地不足已成为一个问题。”

如何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以捐赠物品组成的爱心超市成功地运转下去,这确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对此,在采访中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如下的对策。

捐、卖、赠合为一体

能不能以低价销售来养爱心超市?拿教育社区的爱心超市来讲,他们为了扭转爱心超市的经营问题,创新了“捐、卖、赠”等新的经营方式。

位于教育社区办公楼一楼的爱心超市内,货架上满当当的都是各种物品,这里和其他爱心超市完全的公益性不同,他们不仅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向低保户免费的发放之外,还低价的销售各种物品,“这种苹果,超市都是卖5元钱一斤,我们这里卖4.5元;这种食用油,超市53元一桶,我们这里48元……”林科说:“教育社区的爱心超市是希望能够以卖的东西来养这个超市,也就是增加超市的造血功能,让这个超市不仅可以接受捐赠、发放物品,还能创造一些价值。”

多做活动 盘活捐赠问题

如何能让爱心捐赠的观念深入人心,是每个爱心超市都头疼的问题。二七区爱心超市建立伊始,曾刮起一阵“捐赠热潮”,可是2008年一年只有3000多件的捐赠物品着实不够发放。2009年,这个爱心超市开展了多个活动,在中秋节的时候,让捐赠方和低保户面对面的定向捐赠;



工作人员接收到的捐献物品

2009年11月在鞋城开展上门捐赠活动等。这项措施卓有成效——2009年,该区收到6041件物品,现金1500多元。

同时,这个爱心超市还将“触角”伸到了各个社区,将服务的群体进一步扩大:全区125个社区均设有捐赠站;只要是困难群众需要帮助,去社区、办事处或者区民政局的爱心110办公室,如果情况属实,就可以得到一张救助卡,凭卡就能领取物品,不限量。

这些办法和积极的措施,无疑对尴尬中的爱心超市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对此,郑州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王万民对记者表示:“对于郑州来讲,这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许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会不断摸索中前进。”

王万民说,郑州市目前没有一家市级的爱心超市,这将成为2010年慈善总会工作之一,届时也许能和某些大型超市联系,具体的运作方式正在研究。

他说:“加大宣传力度,让捐款和使用情况进一步透明化;加强规范管理,定期将捐赠和发放情况向市民公布;还有创新机制,增加爱心超市的造血功能,让爱心接力;扩大服务内容等种种方式,都将是让我们让爱心超市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办法。”



郑州市爱心超市一角

市民收入被拉高 是在玩数据繁荣

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不小心一句“六成民众收入系被拉高”,说出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统计数据虚假。虚假的统计数据有着两个功能,对上邀功请赏,对下欺世盗名。早就有人怀疑过“平均工资”、“人均收入”之类数据统计的可信性,媒体公布出来往往是“x×阶层平均收入每年增加百分之x×”,虽然大家直观感觉收入下降,可这种怀疑又没什么依据,毕竟中国这么多人,自己收入降了不代表其他人降了呀。

所以有人嘲讽统计学是一门欺骗的科学,统计部门人员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掌握了发表数据的话语权。统计学本身自然具有科学性,但其中亦有欠科学性的一些统计指标,尤其当统计与商业或其他什么挂钩的时候,统计学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了。因此痛斥统计数据欺骗性的人比比皆是,马克·吐温就愤愤地说:“世界上只有三种形式的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可见,统计数据的虚假绝不是国内才有,但这种虚假的吉尼斯纪录要说是国内发生恐怕也没有争议,大跃进时期不是有亩产13万斤的统计数据吗?

在信息化的时代,一切都被数字化了:每天公布各种数据,广告利用数据做宣传,公司报表成为股民判断股市走势的重要依据,时不时还有研究机构出来发布研究数据。眼花缭乱的数据包围着你,即使对数据的真实性有疑问,也无暇仔细研究,转身就已淹没在更加海量的数据大潮中。虽然说数据虚假是一个无法根治的问题,但这不代表数字化是一个错误的潮流。数字化是为了让政府管理和企业生产更有效率,而不是让统计数据成为政治或者商业的欺骗术。

如果说数据本身是现实社会的抽象形态,那么数据虚假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扭曲。这种扭曲有两种恶果,它一方面制造数据繁荣,掩盖社会问题,给政府理性决策造成困扰;另一方面它会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虽然统计数据的虚假是世界普遍的现象,但在我国,此风似乎尤甚。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有两本账,一本是自己掌握的真实数据,一本用来应付上级;某些重要普查可能只是直接按照某一指标填写,统计学意义上的科学普查很少见;更可笑的是,统计数据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报喜的数据如GDP,总是往上升,报忧的数据如失业率,总是往下降。统计数据就像一个橡皮泥玩具,想捏成什么形状就能捏成什么形状。数据繁荣是一种类似于股市泡沫的危险行为,但由于每一个官员行为的短期性,他们只会把这个数据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泡沫迟早有破灭的时候,因为这种虚幻感可以欺骗一时,终究会成为全民侧目的皇帝新衣。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建立完善的统计监督体系,而不是一味让“被拉高的收入”一再地出现。 迅迅

拜托公职人员不要再出“雷语”

近来,“雷人”话语记录仍在被一些社会事件中的相关人员刷新。哈尔滨市供热办无视8000多件供热投诉,却指责媒体报道没有“注意社会和谐”;昆明新机场配套立交桥支架垮塌造成30余人伤亡,工程承建方却称“不排除有天气原因”;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一名副局长嫁女,在五星级酒店摆出百余桌宴席,面对舆论批评却称“我也有苦衷”……

这些“雷人”话语之所以“雷人”,首先在于其荒唐可笑。无视群众投诉却声称“社会和谐”,明明是工程质量问题却声称“有天气原因”,违反纪律铺张浪费却声称“有苦衷”。连小学生都知道几乎毫不相干的问题,相关人员却硬要扯上因果关系,岂能不成为笑谈?

这些“雷人”话语之所以“雷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说话人的公职身份。针对舆论焦点表达个人看法,是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但是,公职人员发表言论,除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约束外,还受到党纪政纪约束。我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禁止公务员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也要求法官不得针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因为手中掌握公权力的人,言论往往被当作“官方表态”,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

言为心声,言为政声。那些居高临下、乱下结论的“雷人”话语,反映出个别公职人员权力观念错位、群众观念淡漠,忘掉了“人民公仆”身份,忘掉了自己手中的一切权力受自人民,只能用于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不能对人民指手画脚甚至推脱责任。

近年来,铁力大桥垮塌事故“周老虎”事

件、“躲猫猫”事件、周久耕事件、“徐宝宝”事件、“钓鱼”执法事件、女检察长“豪车风波”等一再证明,事件发生之初公众的质疑并非凭空臆断,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个别公职人员的表态并非没有瑕疵。在这些舆论焦点形成过程中,个别公职人员不顾基本事实、急于公布事故原因、责任真相的言语,起到的不是解释疑惑作用,而是推波助澜,不仅无助于澄清事件真相,而且越描越黑,使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受损。

公职人员“雷人”话语频出,暴露了其任职素质的欠缺,背后是对公开政府信息、维护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抵触。面对公众关切,公职人员只有讲真话,才能有效引导舆论,化解矛盾,才能真正维护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黄冠

低碳不是给代表委员发电脑的理由

北京海淀区今年“两会”很特别:海淀区给400多名人大代表和350多名政协委员人手发放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并允许会后带回家使用。理由是,要开一次“低碳会议”。海淀区人大、政协会议于上周五结束。海淀区有关方面昨晚向羊城晚报记者证实,采购这批笔记本电脑共花费了500多万元。(1月20日《羊城晚报》)

北京海淀区召开“两会”,给400多名人大代表和350多名政协委员人手发放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并允许会后带回家使用。理由是,要开一次“低碳会议”的需要。会议是“低碳”了,然而500多万元的公共财政,却流到了代表委员的家里。笔者以为,“低碳”不是给代表委员发放电脑的理由。

召开“低碳两会”符合环保精神,减少文件的纸张使用也符合环保精神,但是发如此之多的电脑是否符合环保精神呢?正如有网友所说,会议期间就算全部用纸质文件,其价格也不超过一台电脑的钱,怎么算都不合理。如果算环保低碳账,纸张比这么多电脑要环保得多。

退一步说,即使给代表委员发放电脑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发给代表委员的电脑也不能为私人所有,应该在会后交公,以便下次会议使用。去年全国“两会”也给代表委员发了电脑,但仅供会议期间使用,并没有将其赠送给个人,而是会后收回,下次会议重复利用。海淀区召开“两会”,将会议期间发给代表委员的电脑,会后赠送给代表委员,是典型的借“低碳两会”之名,行集体腐败之实。

海淀区给代表委员发电脑还有一个十分可笑的理由。区委宣传部有关人士说,由于海淀区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多,故基本没有不懂电脑操作的;不少人家虽然已有电脑,但“总不好让其私物公用”,因而发放电脑。这就是说,赠送代表委员电脑,是工作需要。对此,我们不由得要问,代表委员既使家中有私车,倘若深入基层,明察暗访,调查研究,岂不是也不能私车公用吗,海淀区下一步是否还打算赠送代表委员每人一辆小车,以免代表委员私车公用?真是集体腐败,何患无辞!

海淀区以召开“低碳两会”为名,给代表委员发电脑的做法,开了集体腐败的“新风”,一旦蔓延下去,一些地方的公共财政极有可能成为人人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后患无穷。 冬冬

不能苦了领导

一则“无锡豪华顶级会所只准官员入内”的帖子近日在网上流传。记者调查得知,该会所是惠山开发区开办按四星级酒店标准在一个湿地公园上建造的。面对网民质疑,惠山开发区党政办主任称:这有什么好质疑的,共产党办一个酒店不就是为了招待领导时,标准高一点,接待好一点吗?其实就相当于政府搞的食堂,只不过是“特殊食堂”。(1月20日《现代快报》)

这位开发区的“管家”算是说了大实话。领导也是人,也要吃吃喝喝,而且也想吃得喝得好一点,感觉舒服一点。而且还是引导无证摊贩入场入市经营。这咋能与乱摆摊、不接受卫生管理相提并论呢?合理设置,就是顾及了城市的分布问题;入场入市经营,正好让游商有位可定,有地可停,这是在规划与引导下进行的合理摆摊设点,怎么就不公平了?如果有金钱做后盾,这些城市底层的百姓,当然



城市为小贩设摊是合理的

不负责任。我对这两点理由不敢苟同。

首先,城管委说了,在有条件的区域通过合理设置的一些过渡性临时早市、夜市、便民农贸经营场所、小型专业服务的摆摊设点等,引导无证摊贩入场入市经营。对此,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长波了冷水。他指出,这“绝对是一种不公平、不负责任的行为”。(见1月20日《广州日报》)

这位副市长所谓的“不公平和不负责任”,是指乱摆卖又不交税、对正规业户造成不公平,同时乱摆卖不接受卫生管理,卖出去的东西给市民吃,又是对市民的健康

愿意去作有店的正规业户。况且政府部门规划的这些临时摊点,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管理做到不影响正规业户的生意。

再说卫生管理,这本是政府卫生监管机构之责,怎么成了游商不接受管理呢?既然是城管部门规划的不影响城市功能的过渡性市场,那么,这些地方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本是卫生执法部门的职责所在。管理好了是应该的,没去管理或管理不到位,那是失职。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将政府管理缺位之责转嫁到这些游商身上。 明华